

VIE NNA

维也纳  
一家人

[奥] 埃娃·梅纳瑟 著

任卫东 译

Eva Menasse

人民文学出版社

VIENNA

维也纳一家人

〔奥〕埃娃·梅纳瑟 著

任卫东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6-2828

Eva Menasse

VIENNA

---

©2005 by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Köl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也纳一家人/(奥)梅纳瑟著;任卫东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ISBN 978-7-02-006778-7

I. 维… II. ①梅…②任… III. 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4863 号

责任编辑:欧阳韬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马云峰 责任印制:李 博

### 维也纳一家人

[奥地利]埃娃·梅纳瑟 著 任卫东 译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68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978-7-02-006778-7

定价 18.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目 录

开始 .....	1
厚颜无耻 .....	16
幸运与不幸 .....	32
闪黑转场 .....	50
新的开端 .....	68
晚年的爱情 .....	85
战争结束 .....	107
看法问题 .....	122
祥和宁静的生活 .....	138
受害者还是元凶 .....	161
访客 .....	181
扮演角色 .....	197
后果 .....	217
继承人 .....	234
回首往事 .....	247
结局 .....	263
讣告 .....	281
译后记 .....	306

## 开始

我父亲出生时是急产。他和一件皮大衣成为我奶奶狂热桥牌瘾的牺牲品，当时，尽管已经出现了产前阵痛，但我奶奶坚持要打完一轮。我奶奶一生中，除了这唯一一次戏剧性的意外，每次都坚持把牌打完，因为对她来说，中断牌局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这一次，她为了打牌，差点儿耽误了我父亲的出生。或者更准确地说：我父亲差点儿在一张铺着绿毯子的牌桌下出世，当然，假如真要那样的话，也和他的性格及人生道路有几分符合。

我奶奶生活中唯一的乐趣就是打桥牌。她跟我爷爷结婚，从一个贫瘠的小山村嫁到了维也纳，自从那天起，她就几乎天天和熟人们在“农民之敌”咖啡馆打牌。这是她对抗生活的方式。周围世界很少能让她愉快，于是，她就视而不见，躲进咖啡馆打桥牌。

我父亲出生的那一天，她仍然坐在咖啡馆打牌。那天的牌局开始晚了。她们还点了咖啡。阵痛似乎并没有加剧，我奶奶的女牌友们当然不会理会。算账时，她们照例又吵了起来。其中有一个输了从来不马上交钱，总要求欠着，所以引起算账时的混乱。其实也就是几毛钱的事。也许有时候某个人能赢一块钱，但第二天肯定又会输掉。反正，她们打牌没有大输大赢。尽管如此，她们之间还是争吵谩骂、相互指责。她们中间有两个算不清账，还有两个眼神不好还不愿意承认，我奶奶就是其中一个。

那个每次负责算账的人,是那两个算不清账中的一个。她老是算串了行,不知道是因为不专心还是不诚实。因为她有时候计算错了也让自己吃亏。另外,她写一手非常小的花体字,特别是数字。

第三个就是总要求赊账的那个,她只愿意支付前一天打牌输的钱。前一天她也输了。在我父亲出生的那一天,她输得最多。她当然不愿意交钱。第四个人我不知道是谁。

那天,“农民之敌”咖啡馆的那个伙计总也不来。他是城里有名的帅哥,除了我奶奶,那些女人们都爱跟他撒娇发嗲、打情骂俏。我奶奶从来不这样。她身上有些东西早就冰封了,她是个美人,脸色苍白、头发金红,只以讥讽和严肃的性格示人。她只在家里吵闹。她有一对传奇般的巨乳。“农民之敌”的那个伙计对她的态度与众不同。他至少比我奶奶小十岁,那些女牌友们尽管常常猜测他和我奶奶的关系,但她们从没有说出来过,甚至没有偷偷议论过。而面对冷漠孤傲、拒人千里之外的我奶奶,那个伙计可能只是表现出尊敬,我奶奶或许从来没有注意过他。在我父亲出生的那一天,我奶奶只是生气地注意到,那个伙计没来。女伴们在她们的钱包里翻来翻去,在丝绒长凳上蹭来蹭去。我奶奶变得焦躁不安。天黑了,她的阵痛越来越厉害。

我大伯当时七岁,灯一亮,就被惊醒了。他睡在一个狭窄的沙发上,横在他父母的大床床脚处。他本来睡得好好的,可是屋里突然亮了,他母亲也开始大声叫喊,于是他就醒了。她穿着一件波斯产羔羊皮大衣,横躺在床上。我爷爷也在叫喊,不过是站在门边喊。另外,我父亲也在哭喊,后来他们经常说起,我父亲当时一下子就滑出来了,把那件皮大衣都弄脏了。

我父亲哭喊着,对新生儿来说,这是很平常的。我父亲一生中对所有平常的事情都非常认真,哪怕他实际上很少成功。我奶奶对她这最后一次怀孕的态度,以及这次分娩本身,就特别要求,从一开始就尽量平常行事。我奶奶当时已经四十多岁了,本来不想要这第三

个孩子。她用了针刺、热水盆浴、从桌子上往下跳等各种办法，试图把这个孩子弄掉。她后来老爱说这些事。但是，家里人后来说起这事的时候，都认为，我父亲肯定是躲过了针刺，并且在我奶奶从高处往下跳的时候抓的紧紧的。不过，关于热水盆浴，他们什么都没说。我父亲说，他这么快、这么痛快地滑出来，是为了合我奶奶的意，但是，很少有人办事能合我奶奶的意。她说，我父亲搅了她们的牌局，还弄脏了她的黑色皮大衣，那是我爷爷送给她的，我爷爷为了给自己那些数不清的风流韵事赎罪，送给我奶奶很多贵重的礼物，那件羔羊皮大衣就是其中的一件。通常，我奶奶会一言不发地收下礼物，然后去咖啡馆打牌。

我奶奶叫喊着，因为接生婆还没有来。因为孩子的脐带还没有剪断，到处都是血。而我爷爷既不知道把老大、也就是我大伯，先带出房间——我奶奶认为这样做比较合适，也不知道穿上衣服去找个医生或者接生婆。

我爷爷其实不习惯大声喊叫，他喜欢嘟嘟囔囔地骂人，不过当时，因为我奶奶在叫喊，他也大喊大叫起来，否则就没人能听见他的声音。另外，他的神经几乎要崩溃了。床上的景象既荒诞又吸引他。这肯定能让人联想到古希腊神话：生出一个一半是黑羊、一半是人的东西。不过我爷爷根本不懂古希腊神话。当着丈夫和儿子的面，我奶奶感到羞愧，她用皮大衣紧紧裹住下半身。她侧身躺着，用自己的身体拥着我父亲。我父亲只露出个头，在黑色羔羊皮大衣的映衬下，更显得鲜血淋漓。

“都赖你，”我奶奶喊道，“谁让你那么晚接我！”

“我的围巾呢，”我爷爷站在门边喊着，“你就该早点回家！”

“是你非得要这个孩子的，”我奶奶喊，“在门边的柜子里！”

“肯定是你非要打完一轮，”我爷爷嚷道，“哪个柜子？”

“谁知道你又跟哪个小姑娘鬼混来着，”我奶奶嚷道，“你这个瞎子，不是告诉你了吗，门边上！”

“我走了，你安静会儿吧，”我爷爷无可奈何地说，他找到了围巾，

准备出门了。每个人都知道，哪怕是不太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的情人们都是犹太女人，而且都是结了婚的。他从来没有跟未婚姑娘有过关系。他只跟唯一一个姑娘关系较近——那就是后来嫁给他的我奶奶。

我父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人世的：我爷爷——也就是他的父亲，是犹太人，酒类推销员，我奶奶——他母亲，是信奉天主教的苏台德德国人，后来退出了教会。

几个星期后，我爷爷的一个妹妹，古斯特尔姑奶奶来看孩子。古斯特尔姑奶奶嫁给了一个有钱的基督徒，从那以后，做派就像个高贵的阔太太。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太爷爷，早就认定他儿子、也就是我爷爷娶了个异教徒媳妇是辱没家门的事。尽管我奶奶家并不是布拉迪斯拉瓦，而是弗洛宇登塔尔附近的，但是，每次说起她时，我太爷爷都会非常厌烦地说：“一个布拉迪斯拉瓦的异教徒，来到维苏威火山抢夺熔岩。”他们之间关系冷淡，只保持着最必要的往来。我爷爷的父母是塔诺弗人，后来移民到了玛策岛上，离奥佳登很近。他们住在一条灰暗的小巷里，夏天阴凉潮湿，房子的楼梯间里充斥着发霉和煤烟的味道。“都是些鱼贩子和规规矩矩的庸人们，”我爷爷总是非常不屑地谈论那里的人们，“毫无情趣，陈腐而粗俗。”他搬到了都勃林区，那是医生、律师、公证人、歌剧演员、房东们和丝绸工厂主们聚居的地方。但是，我爷爷只买得起都勃林区边缘的房子，不过这不重要。不管怎么说，那里还算是德布林区。

当古斯特尔姑奶奶把自己即将结婚的消息告诉她父亲时，她已经知道，之前我爷爷闹得沸沸扬扬的那场丑闻，现在已经逐渐被人淡忘了，古斯特尔姑奶奶从小就是个有心计的人。“他是犹太人吗？”她父亲问，在那一刻，在古斯特尔姑奶奶眼里，我太爷爷当时肯定显得非常软弱无能。她围着一条新狐狸皮披肩，两只狐狸眼睛在她的肩上熠熠发光。这是那疯狂爱上她的未婚夫不久前刚献给她的，她从里到外都在炫耀着。“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个银行家。”古斯特尔姑奶

奶的回答，后来成为我们家族中的一句经典，从此之后，如果大家想说谁是个没什么坏心眼儿的傻瓜，就常常引用这句话。之后不久，大家就发现，古斯特尔姑奶奶要嫁的那个心地善良、短命的阿道尔夫·“多里”·柯尼希斯贝格——也叫“柯尼希斯贝”——就是这么个傻瓜。

结婚以后，古斯特尔姑奶奶的傲慢就愈演愈烈。第一个明显的做法就是，柯尼希斯贝格经理夫人换了打牌的咖啡馆，因为咖啡馆也是有等级差别的。她不再去“农民之敌”或“别犹豫”之类的咖啡馆，人们私下传说，她去环路附近的咖啡馆打牌了，去那里的都是些枢密顾问夫人和工厂主遗孀，她们养尊处优、无所事事，个个胖得脖子上圈一圈的珍珠项链都不是挂着的，而是平放在扑满白粉的胸脯上。当时古斯特尔姑奶奶还没那么胖，不过她有基础。

她也很少去住在小巷子里的父母家。不过，她倒是常常挎着可爱而又愚蠢的多里的胳膊，出入剧院。她还去泡温泉疗养。她试图接近大资产阶级，她陪家庭败落的男爵夫人玩牌，并且控制着自己的好胜心，有时候故意让那些夫人赢钱。她巧妙而又坚决地一下子跨越两个阶层向上爬，而不是像我爷爷那样，只是上升一个阶层：从玛策岛到都勃林，从移民过来的会计（父亲）到本地的酒类推销员（儿子），他认为，这已经是人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了。但是，最让我爷爷恼火的是，古斯特尔姑奶奶脖子上耀武扬威地戴着一个镶满宝石的十字架，他管那叫做“上帝的磨盘”。不过，古斯特尔姑奶奶的确是从她成为柯尼希斯贝格经理夫人那天起，就挂着那玩意儿的，并不是像我们家里后来有人恶意说的那样，说她是纳粹来了以后才戴的。

古斯特尔姑奶奶来看望新生儿，她审视地弯下身，打量着我父亲，她的十字架在我父亲的小鼻子上方晃来晃去，她说：“看着有点儿像‘农民之敌’的那个伙计。”我父亲用他那婴儿蓝色的眼睛——他的眼睛一辈子都是这个颜色——盯着她，然后伸手抓住十字架，一把拽了下来。我爷爷拒绝赔偿那个坏了的十字架，因为他认为，要是那项链不

是本身已经坏了的话，一个婴儿是不可能拽断项链的。他还对他妹妹说，她应该庆幸，幸亏孩子把项链拽下来了，否则，她的磨盘要是掉在咖啡馆里，就找不着了，谁知道那儿的那些基督徒们是不是诚实呢。然后，他又讥讽地说，不过，这么大一块儿东西，不论掉在哪儿，她都应该能听得见的。

后来，每当说起古斯特尔姑奶奶，我爷爷总是说：“没错，项链中最弱的那节有多结实，整个项链就多结实。”照我爷爷平常说话的风格，这话实在是太没新意了。但他不多说了，因为，自从在纳粹时期，古斯特尔姑奶奶有一次在街上视而不见地从他身边走过，他就不愿意提起她了。我家里的人总说，那次，古斯特尔姑奶奶胸前的金十字架非常显眼。

总的来说，我父亲生命中的前几年过得很平常。他天天拉着他那美丽而严厉的母亲的手，去咖啡馆，被我奶奶的女牌友们夹在中间，坐在凳子上，她们只关心她们手里的牌，还用眼角瞄着那个伙计，我父亲一晃悠腿，就会遭到她们的呵斥。在每一把牌中间的空隙，当其中两个女人的注意力暂时转移到走来走去的伙计身上时，当记账的那个女人又心不在焉地写着细小的数字时，我奶奶有时候会压低声音狠狠说一句：“坐直了！”

我父亲是个安静、友善的孩子。他学会说话之前，就会打桥牌了。我们家族内都传说，我父亲会说的第一个字是“一轮”。他能连续几个小时看别人打牌，这种不是一个小孩子应该有的注意力是非常令人惊讶的，这本来是应该引起我们家里所有人注意的。但是，在这个家里，他们偏偏没有觉得这是个灾难。

四岁的时候，我父亲有了自己的一副牌。一年以后，我父亲试图在牌桌上给我奶奶的牌友递暗号——在打出某些牌时，他就转一下眼珠，于是，我奶奶命令我大伯每天下午看着弟弟。我大伯就非常不情愿地把我父亲带到附近的公园和杂乱的绿地去。我大伯跟他的朋友们开始胡扯，我父亲就坐在地上自己摆牌玩儿。有时候，他会引起

某个孩子的兴趣，那他们就一起玩，当然，他们都是带输赢的。我父亲总是赢家，每次，他都带着迷人的、蓝色眼睛里的笑意，最后把弹球、硬币、奶油糖等赌注统统收入自己的口袋。六岁以后，他就经常在公园里设牌局，通常是比他大一两岁的女孩子们来玩。当时，所有公园里的男孩游戏都不准带女孩子玩，我父亲不理解是为什么，也不以为然。他从一开始就喜欢女孩子。他对所有跟他学打牌的女孩子都同样耐心和友好。至于其他男孩子为此笑话他，他似乎根本没注意到。他总是高兴地邀请所有有兴趣的孩子们玩牌，并要求他们先把赌注亮出来。那些年纪大些的男孩子们，也就是我大伯的朋友们，嘲笑他和他的牌。但是，当他赢的宝贝越来越多，他的口袋被弹球撑得鼓起来时，他们试图赢回来一些。可是他们赢不了，于是，他们有一段时间很崇拜他，但是很快，他们认定他是个骗子——从某种更高的意义上说，他们或许有道理。他们殴打他，把他赢去的東西又抢回去了。

一天，当我父亲和大伯经历了这样一场殴斗回家时，他们在路上就害怕我奶奶的咆哮。她会责怪我大伯没有照顾好弟弟，骂他是“多余的废物”，什么事也做不好。她会粗鲁地晃着我父亲的肩膀骂他，因为他把衣服弄脏了。她骂他“脏得像只芦鹑”。她还会骂到我爷爷，说他用这两个孩子拖累她。我奶奶在家里发火时会骂出非常有创意的话来。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光，那时候，她已经分不清自己的孩子和孙子们了，更分不清她每天要吃的无数药片了，那时候，她拥有的只是对这个她即将离去的世界的愤怒，她恨这个世界还不让她死去，那时候，她那变态的骂人艺术达到了高峰。她用最恶毒的语言责骂照顾她的修女。尽管受尽了粗鲁的辱骂和折磨，那个修女仍然兢兢业业地照顾我奶奶，给她喂饭、擦洗、端屎端尿。我父亲天生和善，到了晚年更是如此，每当此时，他就会喃喃地道歉，把修女先带出去。直到门边，他还不停地安慰修女，他用一只手抠着另一只手的指甲，眼睛盯着地面，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总之，他那样子就像是个人害羞的、令人怜惜的可怜虫。回到我奶奶身边后，他会充满责备地说：“妈

妈，不管怎么说，她为你做了多少事啊！”

“她为我做什么了？”我奶奶怒吼道。

“她给你擦洗、照顾你，她对你很好”，我父亲感到很窘迫，一方面，我奶奶对修女所表现出来的恶劣态度让他感到很不舒服，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对自己的母亲提起她身体上的虚弱和缺陷。

“她好？你知道什么”，我奶奶怒吼道，“她是一条披着狼皮的蛇！”

那两个男孩子回家时，面临的就会是这样的责骂。我父亲哭了，因为他最痛恨的就是身体的冲突。他根本不愿意接近其他男孩或男人，这种胆怯是唯一限制了他出色的足球天赋继续发展的重要原因。这也让许多人感到惋惜和气愤。那天，他走在我大伯身边，我大伯正在默默地咒骂弟弟——我大伯从来不多说话，就连别人问他的时候也是这样，——我父亲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他每走一步，凉鞋上一块撕掉的皮子就会啪唧啪唧地拖在石子路面上。他的脚脖子擦伤了，裤子的贴边被撕破了。他右腿膝盖流着血，左腿膝盖磕青了。但是，最严重的是，他的牌丢了，全都丢了，只剩下一张。大部分都被那些打他的男孩子们故意撕毁了。他们撕牌并不是出于施虐的目的，而是为了严正申明他们的规矩，那就是，在公园里不许再玩牌。我父亲好不容易从他们的群殴中逃脱出来时，他不得不放弃其他那些牌，其中包括美丽的、上面画有梅花和方块的牌。为了我大伯的名誉，我必须老实说，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弟弟，表现得像个英雄，尽了他最大的能力。但是，我大伯从小就身材矮小瘦弱，而且一直如此。结婚照上的大伯，看上去很像十二岁时的弗朗克·西纳特拉<sup>①</sup>，而不像是个获得了许多奖章的热带丛林战士，他当时的确是一名热带丛林战士。

我父亲只剩下唯一一张牌。在厮打的仓皇中，他来不及多想，就抢回来这一张，不管他们怎么踢他撞他，他都没有撒手。回家的路上，他张开手，那张牌已经被攥成了一个汗湿的纸球。展开后他发

<sup>①</sup> 弗朗克·西纳特拉(1915—1998)，美国歌手，电影演员，被称为爵士歌王。

现，他抢救下来的是一张红桃 Q。他认为这是个好兆头，因为一直到那时，也就是我父亲八岁那年，他还是个乐观主义者。

他们回到家里，发现气氛很异常。在楼梯间，他们碰上了两眼冒光的姑姑古斯特尔，她可是个稀客。她招呼也不打，像踩着一朵香水云似的冲到了大门边，然后回过头来看了他们最后一眼，这一眼几乎有点儿人味儿了。他们的母亲坐在厨房里，看上去好像变成雕像了。她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然后才开始机械的责骂他们。不过，这回她好像力气不够，她好像只是出于为了维持中断了半个小时的传统的责任意识在骂。后来，我们家里说起这事时，总是带着些许的感叹赞许和毛骨悚然、冷笑着点着头说：就连在这一天，她还在骂。

我爷爷也在家，他焦躁地走来走去，他的记账簿突然显得多余了，前几天，他还带着账簿从一个咖啡馆跑到另一个咖啡馆、从一个杂货店到另一个杂货店、从一个餐馆到另一个餐馆，记录他们订的酒，现在，他只是出于习惯还在胳膊下夹着账簿。他外表看上去还跟往常一样，打扮精致，头发用发油梳得服服帖帖，穿着一件熨得平平展展的、绣着名字字母缩写的定制衬衫，他一直是个衣着讲究、享受生活的人。但是，今天，他的烦躁超过了平常的限度。

从这一天起，我大伯自动担当起了照顾我年幼的父亲的责任，而之前，我大伯一直不愿意管这些事。他脱掉我父亲破了的鞋，洗干净他的膝盖，让他睡觉。

第三天，我爷爷他们就不得不搬家了，他们没有太多时间。带着老婆和儿子住在一层的赫尔曼先生礼貌而确切地通知了他们。赫尔曼先生原来是足球运动员。我爷爷是有史以来最狂热的球迷之一。约瑟夫·赫尔曼被大家亲热地称为“皮皮”，他还在“梦幻队”踢过呢，虽然只是踢后卫，可毕竟是“梦幻队”呀。我爷爷在咖啡馆里如饥似渴地读着体育报，当时，那上面经常会有这样的话：“大家一直认为皮皮·赫尔曼老实、诚实、公平，但是，他在星期天比赛中的表现让我们认识到，他是我们拥有的最强有力的战略家。”但是，最重要的还不是

这些评论,而是赫尔曼在自己禁区里城墙般的不可逾越性,使他在我爷爷这个行家的眼中成为一个中等的足球上帝。

结束了足球生涯后,赫尔曼先生生活得很低调。他不像我爷爷,每周末都要乘有轨电车去体育场看足球比赛,赫尔曼先生很少去,只有非常特别的理由,他才去足球场看比赛,比如,“维也纳第一足球俱乐部”的负责人盛情邀请他上主席台的贵宾席。可能赫尔曼先生并不宽裕。他老婆体弱多病,他儿子毫无足球天赋。有一次,我爷爷在楼梯间问他儿子踢足球的事,他面带愠色地回答说:“您问他是不是也踢球,他踢得那叫什么呀!——不过,您知道吗:他拉小提琴!”就是这个赫尔曼——皮皮——我们维也纳方言里都习惯这么倒过来叫名字——,把搬家的消息带给了我爷爷家,他还在同一天把同样的消息传达给离得不远的、住在半地下室的艾森施坦先生。艾森施坦先生很老了,但很有趣,至少在当时八岁的我父亲的眼里是这样的。如果谁家败落,在所有能借钱的地方都借不到钱了,那么,艾森施坦先生是最后一个还能借出钱的人。——还不仅如此,很久以来,艾森施坦先生就是我那美丽而冷漠的奶奶的崇拜者,虽然毫无希望,但他一直乐观热情。据说,他是唯一一个能让我奶奶偶尔笑出来的人。不,我父亲一直不能忘记的,是艾森施坦先生曾有一次用一些碎皮子演示——至少是理论上解释——如何缝一个足球。

世界一下子变成了一场冒险、一场我父亲还不懂的运气赌博。他高高地坐在车顶上发呆,车子拉着家具和几个箱子,穿过城里,来到一个离环路边的公园非常远地方。那里虽然有美丽的大片绿草地,但是,那里弯弯曲曲的小巷里,弥漫着煤烟和腐烂的气味。他已经忘记了赫尔曼那毫无体育天赋的儿子的面部表情,那天,小赫尔曼带着他的小提琴盒子突然出现在我爷爷家,虽然有些窘迫,但脸上带着一丝明显的、以前从未有过的自信。之后不久,我父亲也很快忘记了在奥佳登附近与他奶奶一起度过的那几个月阴暗的日子,那狭窄的房子和垂老的奶奶的长吁短叹。他奶奶不久前刚刚成了寡

妇，——“不过，这对爷爷来说是件好事”，我们家里后来提起此事的时候都这样说，——我父亲很快就忘记了她黑衣服上散发出的那难闻气味，也忘记了每当他想到，他奶奶那么胖、那么黑，还有哮喘，根本没法上下楼，所以也没法出门，就忍不住要发笑。他偶尔还被允许去奥佳登，但要在他哥哥的严格监视下。很快，天气就变冷了。他忘记了父母亲每天晚上的窃窃低语，他们不再去咖啡馆了；他忘记了大姐卡琦来访时的泪眼汪汪，对他来说，卡琦不太像是姐姐，而是个美丽、遥远、温柔的女神。不过，他哥哥，也就是我大伯，每次都把他推到卡琦胖胖的未婚夫身边，好让他去向他们俩要零花钱，这一点他始终没有忘记。但是大部分事情，他忘了好几十年，有些就干脆永远遗忘了，因为我父亲习惯迅速忘记生活中那些不太愉快的事情，或者他从中提炼出一个意义深远的玩笑。

启程前一天，我奶奶让他的两个儿子在“普尔 & 库布拉”照相馆照了张相。她像以前一样神情冷漠、身材笔直。两个孩子穿着西装，打着无可挑剔的儿童领带，我爷爷还让人在他们的衬衫上偷偷绣上了他们名字的缩写，这是他擅作主张干的，瞎花钱，照例遭到我奶奶的一顿臭骂。可惜，我父亲的那对招风耳没法遮掩，我大伯的耳朵——我奶奶常常满意地说——则长得非常规矩，他看上去并不比我父亲年长，而他那时已经十五岁了。摄影师对我奶奶态度特别好。因为她说话清晰、正确而且没有口音，所以，别人常把她当成德国人，这在当时是有好处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约到了照相的时间，也因为柯尼希斯贝格经理夫人是那里的常客，否则，在圣诞节之前的那个时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我奶奶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谢意。

“普尔 & 库布拉”是一家很有名的照相馆，它能照非常好的人物照。也许是因为太匆忙和临时加的时间，也许是慑于我奶奶的威严或者是因为时局动荡，摄影师有些心不在焉，总之，相片上的两个孩子看上去像是受到了巨大的惊吓。而且，最后这几张照片也不够清晰。

第二天，他们就去了西站。他们叫了一辆出租车，又是一笔没必要的开销，不过，由于是在那个时刻，我奶奶只是习惯性地反对了一下。在候车室里与父母分别的场面，我父亲又是立刻并且永远地忘记了，因为站台上已经等着许多孩子们了，而且似乎只是在等他。他立刻就跟他们玩在了一起，满脸欢快的表情，根本不认生。突然，有几个孩子非常粗鲁地揪住他黑色羊毛尖顶帽上的绒球，“他们想拽下我帽子上挂着的绒球”，我父亲后来说，他拼命反抗，大哭起来，然后开始尖叫。终于，我大伯推开了那伙孩子们。最后，在火车上发现，那顶帽子还是丢了，被不知道什么人拽掉了，丢在了西站站台上不知道哪个角落里。我父亲已经没事了，又开始笑了。火车启动了。他坐在一个抹着眼泪的漂亮小女孩旁边，从兜里掏出纸牌来吸引她。那个小姑娘从来没喝过酒。她也没有玩牌的赌注，她没有弹球、没有扣子，也没有太妃奶糖。我父亲考虑了一下，还是跟她玩了。因为她非常漂亮。尽管他每盘都赢——“你觉得会有别的结果吗”，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他都会说，他在美貌和天赋之间选择了美貌——但是，最后我父亲还给了小女孩一块太妃奶糖，表示安慰。外面，故乡已经远去。负责照顾他们的是那些大一些的孩子，其中有我大伯，他们都很细心，但很生气、沮丧。我父亲对此一无所知。在另一个遥远的火车站，一群极其友好的妇女从车窗给孩子们递进来水果和巧克力。他们说着一种奇怪的德语。我父亲很兴奋，疯狂地向她们挥手。那些妇女们向他微笑。

高烧的父亲在一家医院醒来。带着高高白帽子的护士们跟他说话，她们摇晃他、冲他喊叫，但是他听不懂她们的话。所有的孩子们都消失了，我的大伯，他的哥哥也不见了，他的纸牌就更别说了。我父亲在他一生中第一次这么孤独，深感绝望。他抽泣着，婴儿蓝的眼睛里流出泪水。他神经质地咬自己的嘴唇。护士看见他这样，每次从他身边走过时，都伸出巴掌打他的嘴。当他胆怯地说出自己的某个小小要求时，她们却根本听不懂，转身离去。我父亲开始尿床。这

还不是最恶劣的。最恶劣的事情很快就被护士发现了，她闻到味儿了。然后，他，一个八岁的孩子，坐在便盆上，蜷缩在高高的病床之间。恶毒的护士小姐穿着木拖鞋在水泥地上沿着病床走来走去。她罚他坐在便盆上。他赤裸的小脚冻得冰凉。好像过了一百年，天都黑了，夜班的护士查房时发现了她。她摇摇头，发出了几句友好的声音，把他抱上床。她甚至还用双手给他暖了一会儿脚。

我父亲长大以后，脚也非常小。“最优秀的足球运动员都是小脚”，他总是这么说，然后，我们这些孩子就立刻脱下鞋跟他比脚。我哥哥十岁的时候，脚就比我父亲的大了。据说这就是我哥哥关于童年许多噩梦的开始。当他在大学里第一个学期写一篇关于实效和美丽的关系的哲学作业时，我哥哥在里面用了一大段论述亚洲妇女裹脚的问题。“谁要是见到日本艺妓小脚，就会认识到，用残暴的手段获得美的做法，会直接导致极权主义”，当时十九岁的他满怀激情地写道，“作为人，我们都是平等的，但是，我们看上去并不一样。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为社会服务。脚的作用是站立和行走，如果它丧失了这些功能，那它就毫无用处了。除此之外，不管是它的大小还是形状，都不能说明一个人的价值。”——“很好！”这是他的教授作业上写下的评语。这个教授不懂足球，也是为数不多的、不谈论我哥哥的姓氏和亲属关系的人之一。

我姐姐的脚中等大小，她说要成为一名中等的足球运动员。“这不是女孩子的运动”，我父亲对此不解地摇头，“你还是拿着拍子去墙边练球吧。”

我父亲后来发现，夜班护士是个印度人，她只上夜班。第二天，那个恶毒的护士又来了，木拖鞋的声音远远就宣布了她的到来。她端来的饭我父亲不爱吃。他把头扭向一边。她用一只手紧紧抓住我父亲的下巴，用手指强迫他张开嘴，把饭——一种棕色的粥——塞进他嘴里。我父亲干呕。她又塞进一勺，就像填鸭一样。他吞下去了。在第五口时，他吐了出来。她用英语问他：“你喜欢吃吗？”他盯着她，听不懂。她又问：“你怎么样，你这个小调皮？”她问：“你怎么样？”她